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6NIAN
- SHIG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诗歌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张清华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0年
诗歌

Abstract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6年
诗歌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张清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清华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6年诗歌 / 张清华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3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72-8

I. 2… II. 张…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6057号

2006 年诗歌

责任编辑 常 晶 黄 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责编 Email: huangmcf@126.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038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全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288 千字

印张 10.625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4222803

序

张清华

记得去年我曾用了“蔽日的烟尘”一词，来形容我对诗歌界状况的感受与概括。如果这个比喻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这一年中，弥漫的烟尘已经被强劲的旋风裹挟成为了冲天的风暴和浓云。若说去年的热闹更多地是源于各种官办的“诗会”，那么今年的热闹则已经深化为大众共同参与的娱乐。这使人疑惑，也许这场世纪初的“狂欢”要未有穷期地延续下去了。

因此，关键词还是“狂欢”——再度使用这个词语使我感到窘迫、无力和匮乏，但别无选择。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知道任何言谈都充满了被误解和误置的危险，因为诗歌内部本有的二元性——即“雅与俗”、“高与低”、“精神性与娱乐性”、“精英性与民间性”、“普及与提高”、“建设与破坏”等等的互为依存的两面，在现时代的语境下已经近乎完全分裂，它们之间的相对性、互补性，已因为网络媒体的介入，而陷于分裂的非此即彼。网络上大众话语（有人蔑称之为“网络暴民”）的“虚拟强势”，瓦解并完结了讨论问题的可能。如果你不支持和认同它，那你就只好保持沉默，因为无论怎么说，去中心论、非等级化的

诗歌写作都可以看做是“文化领域中的民权运动”的一部分，具有天然的优越感，无可争议的道德优势，谁与这场欢闹过不去，那就是与大众的写作权利过不去，就会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但情形也不总是铁板一块，早就发生、而在去年又形成了气候的“底层写作”，伴随着另一意义上的诗歌精神伦理的震撼和提升，也在今年保持了势头。尽管这一现象遭到了媒体和少数人刻意的狭义化与误读，被简单化为“打工诗歌”云云，但在媒体化的议论与炒作之外，我们仍可看到对底层生存的关怀、对劳动者境遇的悲悯和对生命尊严的捍卫，在大量的作品中化为了更有深度的和感人的抒写。

欢闹和哭泣，喧嚣中快感的尖叫和悲凉中喑哑的啜泣交错着、交响着，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时代美学的两极。2006年岁末的天空中，我仍能听到这同时飘起的两股旋风，所发出的呼啸与令人战栗的吼声……

1. 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媒介完全有可能

仅仅在去年还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判断，尽管网络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诗歌惯常的写法和风格，甚至在5月份也不可能，那时我在一个由“乐趣园网站”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见到了赵丽华，她送给我一沓题为《赵丽华诗歌》的A4纸的打印稿，共计14页，开头印着这样的简历：“赵丽华，女，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在《南方周末》《中国民航》《都市女报》《兰州晚报》等十几家报刊开辟随笔专栏。现居廊坊。”而我在2006年12月27日的深夜打开“百度搜索”，搜到关于赵丽华的条目一共是629 000条，该网站还自动提供出“赵丽华诗”、“赵丽华的诗”、“赵丽华诗歌”、“赵丽华的诗歌”、“赵丽华梨花体”、“赵丽华博客”、“赵丽华诗集”、“赵丽华诗歌事件”、

“赵丽华简介”等“相关搜索”词条，其中仅“赵丽华简介”一条打开就有60 600条之多。

这是仅几个月之后2006年9、10月间的事情。在“被恶搞”之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赵丽华已经由一个在圈子里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变成了妇孺皆知、街谈巷议、全民追捧或谩骂、抨击又艳羡的公众人物。这里仅打开“中华网/文化频道”上的一条叫做“赵丽华诗歌网上惹争议，梨花体引发公众写诗潮”的新闻，看看其中的内容——

事件回放

赵丽华事件从9月底爆发至今热浪不断。先是她的旧作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流传最广，全诗就像一句话断成四行：“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顿时在网络上引发“爆炸”，多数为批评。有网友说：“天哪，这也叫诗？这种诗我一晚上能写一千首！”但在清华大学的网络论坛上，一位网友称，他的专业是物理学，而赵丽华的诗词一字一字地增长，具有鲜明的量子力学特征，这是令他最为陶醉的地方。

随着韩寒、春树、尹丽川、沈浩波、伊沙、李承鹏等文化名流的加入，关于赵丽华的诗算不算诗的讨论升级到名人粉丝团对骂阶段。赵丽华的博客点击也迅速突破百万。

就在十一长假前夕，“废话诗人”杨黎在第三极书局组织了“930诗歌会”力挺赵丽华，但刚进行不久，因为参加的行为艺术家苏非舒突然脱下衣服，直至全裸，引起大厦保安制止。这起网友称之为“垃圾诗歌引起的垃圾事件”只得中止。众多网友开始在长假中网上赋诗……

面对诗歌界的“混乱”，高校中的研究者却“集体失语”：北京大学的张颐武教授在博客上说：“这些诗让许多

网友抨击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觉得这些诗过度浅白随意，没有诗味；二是由此产生了对于诗歌的怀疑：如此写诗，岂不是人人可以为诗人？”之后就不再接受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诗歌研究者程光炜也只是认为“赵丽华现象是种文化现象，不是对诗的争议”因此不愿置评。网上也只有不同媒体采访到的诗人和准诗人们的看法，众声喧哗却没有权威的看法。

……①

这只是其中普通的一条。我还没有再引用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相关事件：如詈骂者与“力挺”者之间的对骂、“脱衣朗诵事件”引发的官司与沸沸扬扬的议论、此前一个叫韩寒的80后写手对诗歌的“死刑”宣判、还有岁末另一个“中间代诗人”叶匡政“文学死了”的说法引来的狂激笔战与论争……作为“高校中的研究者”我当然也一直对这些事件“失语”。但现在，当我面对一篇过去一年诗歌状况的回顾“序文”的时候，就无法回避这一话题了，如果回避，它就称不上一篇有现实感和现场感的序言。因此在这里我必须表达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犬儒立场”——一个“没有立场”的客观表述，这一事件、这些事件，确是“关乎诗歌”但又“不属于诗歌”本身的“文化现象”。有了这个判断自然就不忙下其他的判断，下判断也改变不了事实——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媒介”，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铁的现实。

我们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走向了它最广大的“大众”，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几年来，我一直以自己无足轻重的文字，支持着这场始自世纪之交的“写作平权运动”，所编选的这本年选也一直力图遵奉着“民间立场”，但现在我正茫然而无望地看着

①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nfo/hot/11022810/20061019/13684947.html

在网络所搭建的平台上，诗歌一日日走向民间和大众并消失在他们的狂欢所扬起的烟尘中的背影。当然，这不是虚妄的愤怒，也不是自作聪明的批判，更不是滑稽的欢欣鼓舞，这是茫然，是承认无能为力的茫然。我想起美国的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波兹曼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与批评最直接的批评家了，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的批评，可谓令人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不是一种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忧愤抒情，而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思考，是对这个世界的冷酷的预言：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在美国，奥威尔的预言似乎与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却正在实现。^①

^①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01～20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而尼尔·波兹曼这样说的时候，显然还只是针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娱乐文化，他或许还没有想象到后来网络世界中的狂欢图景，更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充满着前现代原始积累的苦难与后现代娱乐狂欢的奇怪的国度里，关于一个诗歌的话题和事件会出现这样的奇闻般的轰动，如果他知道，他的预言一定会更富有悲剧的诗意。

但我却不想简单地附和波兹曼的预言。之所以不想完全认同，是因为事情总有两面性，美国人没有经历奥威尔所说的“文化的监狱”的时代，所以他们对赫胥黎关于“文化游戏”可以“毁灭精神”的预言就特别敏感。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能够拥有“参与游戏”的权利是首要的，这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中国的现实还远没有到美国人那一步。记得我在去年还略带着欣喜地来盘点网络媒介给诗歌带来的新质和美学变化，还认同着因为网络而出现的写作平权运动，今天就转而抨击网络对诗歌写作的异化，显然会给人轻浮的印象。我只是说，上述事件的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诗歌作为大众娱乐的方式不但可能，而且已迅速变成了戏剧性的广泛的现实：参与“恶搞”的人发泄了他们针对一个女人、一个写作的女人、一个用非通常的方式写作的人的不满与潜意识想象；观看恶搞的人欣赏到了一个特殊的热闹景观，有了饭桌上助兴佐餐的谈资；“被恶搞”的人呢，则在“受伤害”的同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点击率”和知名度……正所谓各取所需，各得好处。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可见已摇身为现代的公众游戏文化娱乐的主角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而不偏颇地变成现实，让各种角色都从中获益。

事实上，大众文化的狂欢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各个时期它会改头换面以各种方式予以发泄，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借助大字报、批斗会、忠字舞、大串联，“人民”在物质极贫乏的条件下也没有妨碍其政治无意识支配下的狂欢，随后

他们又乐此不疲地集体参与了另一场市场化的狂欢。“将……进行到底”，这是当代中国各个时期都可以通用的规则和句式。所不同的是，现今这样的网络虚拟狂欢不会像那时一样，动辄侵犯和轻易地剥夺人的生存权利，这表明由个体无意识支配产生的行为游戏，总比由强权政治意志支配下的政治狂欢要好得多。网络虽然统治了一部分人的一部分生活，但并未占据全部，在这个世界之中和之外，仍然有着独自的意志和声音，这是我们应该做辩证认识的。但我们也应警惕，公众对网络发表权利的使用，正如在社会意义上对民主权利的使用一样，应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尊重而不是践踏别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恶搞”的心态和滥用的方式，与“文革”式“群众的专制”是如出一辙的。

2. 另一些事件：关于现象的修辞

2006年诗歌界状况的叙述，显然需要若干事件来构成一个“修辞”，这里要记录的有意义的事件大约有这样几个：

事件一：周伦佑主编的两卷“非非”的大书《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后非非16年诗学历程》（均为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可算得上2006年诗歌的大事了。因为这具有象征意义，不止对非非主义诗歌本身，对肇始于1986年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二十年来当代诗歌的变革之路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这两部书是对非非主义诗人群体的写作历程、非非主义诗学实验的一个总结。在当代诗歌的历史上，像这样一以贯之坚持下来的群体，在国内可以说绝无仅有。在最初，他们宣称从语言入手最终抵达文化的变构的说法，还近乎痴人说梦，但许多年以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传入之后，人们发现在非非主义的诗歌理论中早就包含了原创性的“结构/解构主义”的理念了，当代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文化运动，都是从语言/文本/叙事入手、最

终抵达文化/历史/政治的实践。也许不能说非非诗人所创造的诗学理论已真的变成了无可争议的成功诗歌实践，但他们所提供的思想和精神启示，却要大于国内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派别；如果要数当代中国诗人在诗学和语言哲学方面最具原创性和理论生长性的思想，还要首推非非。90年代以来，非非诗人所主张的“在刀锋上的句法转换”，“反对白色写作”的原则，也都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现实，体现了对历史责任和时代良知的担承。当2006年周伦佑重温“非非主义的艺术使命”，强调“非非主义源于诗，成于诗，但高于诗，大于诗，它的更高目标是文化和价值——即通过语言变构和艺术变构以期待最终实现的对文化和价值的彻底变构”^①的理想时，他所预言的“非非主义完全能够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诗歌之外单独成史”的说法，也确实有几分可信和悲壮的意味。

事件二：对历史的总结总需要有心人的努力，关于“前朦胧诗”材料的钩沉挖掘，在2006年获得了新的成果。早年曾参与主编《后朦胧诗全集》的女诗人潇潇，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上，连续推出了她对于前朦胧诗人积年找寻和研究后的所得，介绍并重新刊登了郭世英、食指、依群、牟敦白、王东白、张郎郎、鲁双芹、张寥寥、张新华、徐浩渊、甘恢理、吴铭、杨三白等人的大量旧作，其中有的是在过去的资料如杨健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里提到的，有些则是首次被发掘出来的。这些作品犹如精神的化石、刺眼的生命灰烬，在这喧闹的时代里散发着冷峻而荒诞的光芒。关于“前朦胧诗歌”的研究，虽在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进展，在若干文学史教材上已经出现和认可了食指、“白洋淀诗群”等现象，但关于一个在朦胧诗之前就已存在的普遍而整体性的诗歌事实——“前朦胧诗”

^① 周伦佑：《非非主义：不可抗拒的先锋》《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仍未得到公认。其中主要的困难在于，大部分作品在其存在的历史过程中都未曾发表，有的传抄也只限于极小的范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见证，其原始面貌多已无法考据，所以即便有许多人试图关注，也限于材料稀缺和很难对具体的文本进行甄别，而无法从史的意义上来认定其价值。因此到目前为止，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仍是相当初步的。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即便从目前可认定的少量作品出发，也仍足以证明它的整体性价值，像“贵州诗人群”的“文革”前和初期的创作、食指在1968年前后的诗歌写作、“白洋淀诗群”成员在70年代初期的作品，其在思想与艺术的价值上，都远高于80年代初期广为人知的朦胧诗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前朦胧诗”这一诗歌史概念是到了普遍公认的时候了。

事件三：建设性的诗歌努力，或许还体现在有人对“草根诗歌”或“诗歌的草根性”的强调上。李少君主编的《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草根诗歌说。尽管在宏观的诗歌语境中，“草根”这一说法显得含糊而有歧义，但该书只有百字左右的“序言”中对“草根性”的解释本身还是有意思的：“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性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① 这些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是解决眼下诗歌种种弊病的正途。但这是否就是“草根性”？“传统”和“个人经验”的并不一定是“草根”的，事实上它的内涵还应该更狭小一些，比如有比较边缘化和荒僻感的“地域性”特征的，可能才更符合草根的说法。“草根写作”和民歌本身的原生性还不一样，它还是“文人创作”，所以应该是在相对于“正统”和“显贵”写作的时候才有意义，而不具有当然的自足性。

^① 李少君：《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从美学意义上，地域性和底层性是它的根本特征。而该选集中将王小妮、黄灿然、默默、胡续冬等这样居于香港、深圳、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多数在大学供职的诗人的作品也看做“草根族”，显然不太合理可信，把桑克、陈先发、蓝蓝等这样的诗人放入草根诗选也并不恰切。不过，如果只是将“草根”看做一个“命名策略”、一个简要的说法的话，那么在这一指称下对诗歌本土性、地方性、个人性的追求，当然有积极的作用。

事件四：批评界能够稍稍算得上一点“动静”的，或许还有一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论，2006年初，《星星诗刊》2期发表了笔者的一篇短文：《关于现今诗歌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随后参与讨论的批评家先后有陈超、陈仲义、向卫国、燎原、张桃洲、李少君、赵思运等。这本来是去年我在编年选时所写序言的一部分，因为《星星诗刊》希望我能够提供一篇“提出问题”的文字，所以摘出做了处理，单独作为一篇东西发了出来。脱离了原来的语境，也许文章的意思有了某种偏颇，但总的意思尚能表述清楚，即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崛起、诗人自身生存状况的大变、社会生活浮华风气的弥漫，使一种充满“自恋”情绪的、冷漠的、复制式的、虚假叙事的、一味将“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有了蔓延的趋势，对此诗歌界应做出反思，对假以“技艺”和“纯粹”的名义强加于读者的个人日常生活的小杂碎予以抵制。这篇文字显然只是指出了眼下诗歌“种种问题中的一种”，但“提出问题”之后，刊物为了引发争论，便对这个栏目做了“观点化处理”——变成了“诗歌是否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的问号，其中暗含的命题也变成了一个全称判断：是，还是不是？这样的暗示将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观点之争，而没有沿着问题深入捋下去。前期还在谈问题，谈相关的另一些弊症，但之后就变成了对“是”或“不是”的判断，有的文章还干脆将我的文字指认为是试图为诗歌重新“制造律令”了，真是吓人一身冷汗。

事件五：或许这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事件”——2006年初，一个令人咋舌的消息传出，由诗人骆英创办的中坤国际集团斥巨资三千万，分别投给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由诗人唐晓渡与西川领导的“帕米尔工作室”。不论这笔巨款将以何种形式运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足以抵得上许多年来国家在仅有的几家官办诗歌刊物上投入总和的若干倍。这再一次表明，民间经济力量的崛起使之对诗歌的发展和影响力将越来越上升至首要的位置，我在去年也曾指出这一点，但力度如此之大，势头来得如此之猛，却属始料未及。至少在2006年内，由帕米尔工作室策划和举行的中国诗人与法国和日本等国诗人的大型交流对话会就有两次，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小事情，如此高规格的国际性诗歌对话交流不是由“官方”出面，而是由诗人和批评家自己操办，这也算是“和国际接轨”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诗歌作为文化交流、作为社会性活动，还将进一步民间化。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坏事情。

事件还有很多，比如“博客诗歌”的问世也是值得关注的，博客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现象，正在迅速的发育之中，一种说法是目前人数已达数千万计，究竟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诗歌，还未有人做出统计。2006年3月份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做了“中国当代纯文学期刊中第一本博客专号”，当然所选还是已成名诗人的作品。所有这些现象，也都构成了现今诗歌万花筒般的景观的一部分。

3. 伦理，还是伦理，还有汹涌的才华

世界的平衡规则似乎永远是存在的，在狂欢和恶搞的时代，最强烈的精神伦理的呼声也浮出地表。一年来，在不同的媒体包括报纸、文学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出现了持续的讨论，关于“底层写作”问题，关于“打工诗歌”的问题，有了各种各样的

说法。许多人是冷嘲热讽的，认为底层的人民实际是看不到、也不需要这样的诗歌的，而写作这种诗歌的人是借助特殊的炒作来牟利的等等。我不否认有的写作者是有利益或市场份额动机的，但这么广大范围内的一个有持续热度的讨论，一定有来自公共空间的集体意志，太多的苦难和泪水，太多的不公正和困境，太多的激愤和悲悯情绪，需要人们来体察、需要写作者用更便捷和强有力的方式来传达，来回应。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网络与大众媒介又显出了它的积极的一面，它充当了传达这种社会良知与呼声的迅捷便利的平台。

我读到了一位叫做郑小琼的年轻人的大量书写厂区劳工和个人生活的诗，我得说，它们非常令人感动。为了验证这些诗的“真实性”——因为指摘“底层写作”者的理由之一是那些写作“打工诗歌”的人本身根本不是打工者——我这里抄录一下关于这位作者的身份介绍：“郑小琼，女，1980年生于四川省南充，毕业于南充卫校。2001年南下广东，在一个叫东坑镇的地方打工，开始写诗，有诗歌散见于各报刊，收入数种选集，曾获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现在一个五金厂工作。”（见《诗选刊》2006年2期）我以几乎最大的篇幅选入了她的五首作品，但当我编完之后打开“百度搜索”，点击“郑小琼”这个词条的时候，我简直有惊呆了的感觉，在各种网站上可以读到她的数量巨大的抒情短诗，数量可观的几乎令人窒息的长诗。先让我举出这首《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的开头几句：“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读着陷阱，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二年来，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落下一滴泪/一声咒骂，一句憋在心间的呐喊/我听见的打工，一个衣冠不整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和匆匆夜色，行走，或者/像我的兄长许强描写的那样/‘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我见到的

打工，是一个错别字……”这难道还不能解决了所有的疑问？读这样的诗，你还会怀疑作者的身份吗？这位“打工诗人”的锐利，会让多少自认为专业和富有技艺的诗人无地自容啊。是要论内容——对底层生活的真实叙述呢，还是论才华——看她那日常生活中漂亮而纯美的抒情篇章？我们还是先来看前者，请读读这首《流水线》（多年前舒婷也曾有一篇备受争议的名作《流水线》）中的段落：“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流水线的响声中，从此她们更为孤单地活着/她们，或者他们，互相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纹，塑料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辛劳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

在它小小的流动间，我看见流动的命运
在南方的城市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

好个“低头写下工业时代的绝句或者乐府”，我相信她这样的诗句绝不是虚夸，他的记录底层劳动者生活的作品中，有许多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乐府”——不是形像，而是神似的：“没有一首诗歌返回一个女工的失眠/……回忆入暮的乡村，附近路上的醉鬼们的歌声/一柄沉默的车穿过夜班女工的咳嗽/她听见有人狠揍着铁板样的夜/她听见有人在梦中回味着故乡的欢乐/她听见有人在演讲，争吵，或者低声抽泣/啊，这打工女的夜……她的青春/爱情和光阴，都成了她这个失眠者的不幸”（《清晨的失眠者》）。一个外来的体验和“悲悯者”是不会有这样的切身刻骨铭心的感受的，也不会写得这样质朴而又细腻。

再看才华，让我们读一下她的五百余行的长诗《完整的黑暗》的开头，是何等境界和气势：“三条鱼驮着黎明、诗歌、屈原奔跑/对称的雪沿着长安的酒溶进了李白的骨头/列队前进的唐